

国外编辑出版丛书

# 出版人的故事

● 冯亦代 郑之岱 编译

BIAN JI  
CHUBAN

7.125.4

0

商务印书馆 出版社

责任编辑 张安塞

封面设计 赵 源

## 出版人的故事

冯亦代 郑之岱 编译

书海出版社出版（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6.625 字数：141千字

1988年3月第1版 1988年3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册

ISBN 7-80550-007-X

7504-8 定价：1.30 元

## 目 次

---

### 第一部 书的诞生 [美]罗吉·贝林格姆 著

---

- 一 百年老店(代序) ..... ( 3 )
  - 二 清苦的事业 ..... ( 7 )
  - 三 为作家服务 ..... ( 17 )
  - 四 初次见面 ..... ( 24 )
  - 五 退稿和畅销 ..... ( 33 )
  - 六 佳作之争 ..... ( 41 )
  - 七 脱稿和付印 ..... ( 45 )
  - 八 新书发行 ..... ( 51 )
  - 九 库存 ..... ( 59 )
  - 十 忠实朋友 ..... ( 63 )
  - 十一 期刊杂志 ..... ( 76 )
  - 十二 战后新纪元 ..... ( 83 )
- 

### 第二部 天才的编辑 [美]安·斯各特·伯格 著

---

- 一 帕金斯其人 ..... ( 93 )
- 二 发掘新人 ..... ( 98 )
- 三 海明威的成长 ..... ( 104 )

|   |              |       |
|---|--------------|-------|
| 四 | 知人知心 .....   | (119) |
| 五 | 女作家的特性 ..... | (130) |
| 六 | 生死之交 .....   | (148) |
| 七 | 一代消逝 .....   | (164) |
| 八 | 天才的殒落 .....  | (188) |

---

|    |               |       |
|----|---------------|-------|
| 附录 | 海明威的出版人 ..... | (200)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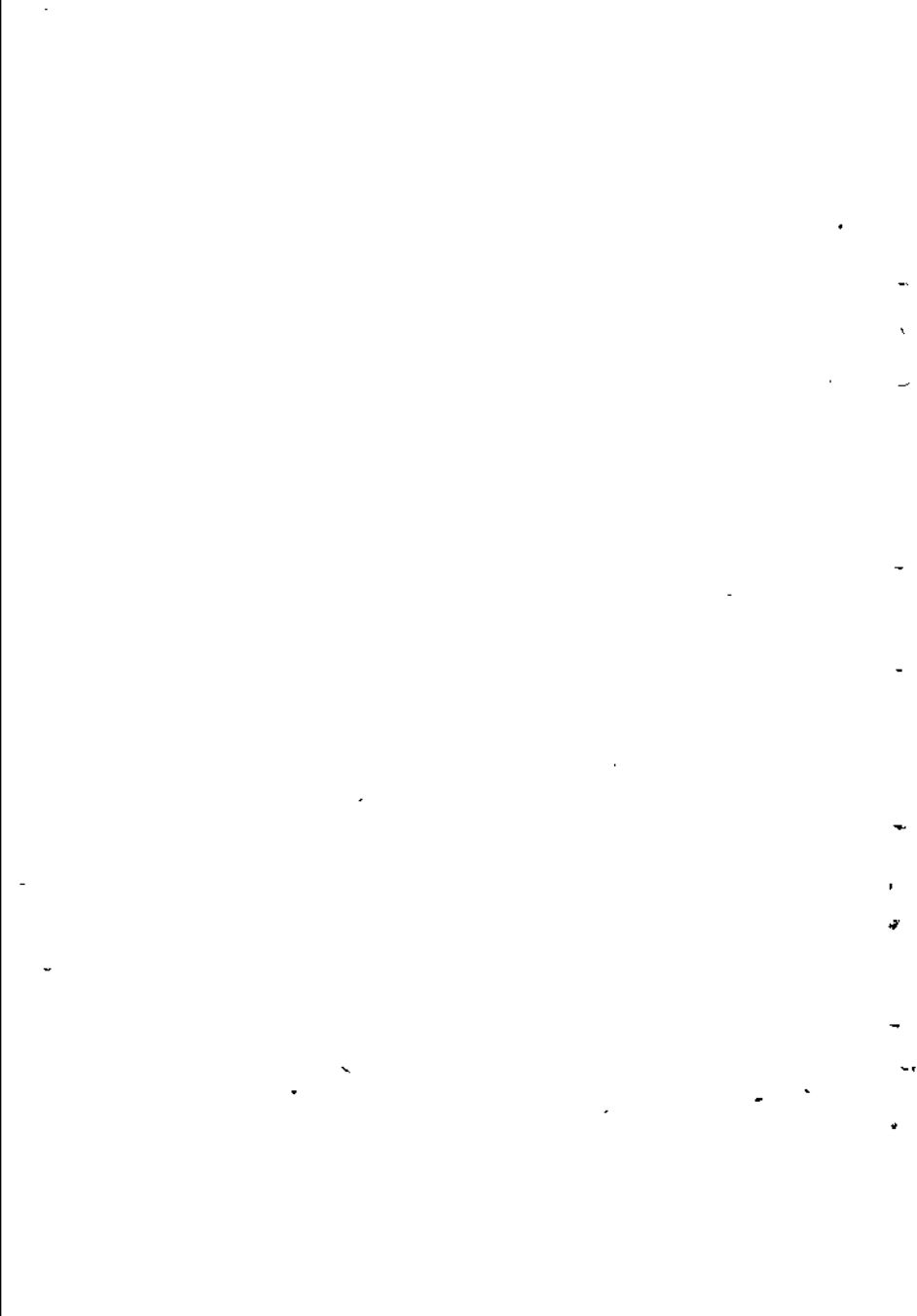
|            |       |
|------------|-------|
| 编译后记 ..... | (206) |
|------------|-------|

---

# 书的诞生

〔美〕罗吉·贝林格姆 著

冯亦代 郑之岱 编译



## 一 百年老店（代序）

二十年代的美国出版业在新世纪中方兴未艾，其他盈利的业主每每对出版业感到困惑不解。出书利润低，销路难掌握，广告又需别出心裁，——凡此种种逼得出版人生路短缺，且不提新世纪中美国的前途变化无穷。但是出版业有一个突出的因素非其他商业可比，那便是拥有生气勃勃的作家队伍。这一因素虽说变化多端无法预测，但出版人无作家群不行，而作家们又非有此出版之友不可。

从读者的兴趣出发，本书还应着重叙述世纪初的作家队伍如何把内心思路通过纸张印刷，与其他商品作竞争，虽然不少读者对一部新书合卷之后就把作者忘之九霄云外，出版人的姓名更不放在心上。反过来，很多读者只慕名文学家而视出版人为一种必然的服务行业以赢利和推销为职责。按旧传统观念，文人多属贫穷清苦之辈，受出版人的欺压摆布是天经地义之事。而从属于出版业的编者更受到两面夹攻，终日处于水深火热的交战中。

笔者三种滋味都尝遍。我的家庭和本人的成长岁月正是这部史料的开端之期，因此对个中真相得以做出一些比较客观的描述。我的文学生涯始于出版业上升的阶段，我的父亲爱德华·贝林格姆是史克里勃纳杂志编辑，他身兼作家与编

辑两职，但始终是作家们的好友。他老人家平生的文学素养颇高，但又得为出版事业争得一立足之地；他深信艺术在任何情况下不应降格迁就，而他有幸获得业主的同样观点和长期合作。

可是作为第三者的我，不断感到其中的紧张空气。很多时候，编者不得不以无比的耐心与作家洽商，而同时又得有勇气抵制老板的压力。我父亲经常为多出好书而斗争，可是又不便使出版人超荷而亏损。除此之外还不能忽视读书界的口味和时尚，我常看到父亲和他的战友威·卡·布朗纳尔为此而苦恼。也就是这一原因，我父亲阻拦我进入出版业，他既不愿我为写作而清苦一生，又不愿我为出书而困顿终日。他不止一次对我说：任你当个工程师或律师，千万别当出版人。偏偏我的数学微积分太差，什么“师”也当不上，而他读了我的文稿却又颇合心意。恰巧史克里勃纳先生向我提供一个就业机会，经过掂量，父亲认为出版人总比作家的命运好些，这就为我定下了终身职业。

这一下子延缓了我的创作生涯达十年之久，出版人究竟离不开企业管理，我只得从学徒干起。就业不久，一位朋友问起我的工作，我当时毫不经心地答道，“办公室跑腿呗，走运的日子粘贴一千张邮票。”不料此话传到布朗纳尔先生的耳中，有一天他找我去谈话：“你说得不错，我们这一行九成九可由办事员来干。可是一月一次或者说每六个月逢一次，那一天的事情非你亲自处理不可，谁都应付不了。你的全部才能和教育也就在此瞬间一显身手。”我也就这样为出版社立下了汗马功劳。

我在史克里勃纳书店工作的十年中，有幸遇到出版界的

佼佼者和作家中最难应付的一代。我不时讥讽、逗乐、宽慰或责骂一批多心而容易激怒的男女作家，以解决他们对出版方面苛求精美、薄利多销或是过分涂改清样后又送来几大张更正条子等等问题，以及一些啼笑皆非的琐事；但终于赢得出版界的信誉和作家的赞许。尽管如此，我依旧忘不了，书店和编辑部之间的长期矛盾：无时不为成本和质量进行斗争；为了不亏待作家或造成出版事故，致使一部畅销书在首次出版后就中断印刷等等。

不久由于年轻无知，我不惜辞去出版工作，选择了当自由撰稿作家。在我的文稿辑成书本时，我竟以同样的不满情绪诉诸出版社和广告部，埋怨版税和封面设计不合格等等。如今每见作家申诉其出版人对他不公平，我是十分同情和理解他的；另一方面念到出版人的含蓄又含糊的答复时，我也颇能懂得这些委婉措辞背后的无限辛酸和容忍。

年事稍长世故深了，回忆起少时不知艰难的精神，再从事出版人故事的编撰工作，不觉另有一番情趣。如今对待两种截然不同而又相辅相成的艺术力量竟能予以心平气和的理解和热忱，并在编撰这本纪念一家“百年老店”的出版史过程中，看到出版事业的宏图，它和我一己生涯的密切关联，不禁为之欣然。作为一个作家，我已能从出版事业中学得更实际的观点，分清是非，找出质量更高而比我所想象更好的设计方案，这都是这一事业给予我的令人满意的结果。

这部出版史的基本事实今天看来可说是不受时间局限的。例如我在重谈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某一作家致其出版人的来信，全部情调、雄心壮志和感到困惑难解的问题等等，几乎和一世纪后的青年作家大同小异，尽管笔调用字各趋时

尚,不可能新人说旧话。例如,翻阅汤默思·伍尔夫(1900—1938)和亨利·詹姆斯(1843—1915)的书信,他俩同是美国文学家中长期游历欧洲,定居伦敦的人,时隔一个世纪,读其信中所述关于文学生涯的清苦几乎与当前作家如出一辙。另外,我又比较了一下小说家斯科特·菲兹杰拉德和哈雷·费德立克向出版人诉苦的信,也谈得一模一样。甚至出版家彼此之间,老史克里勃纳和他的孙子小却尔斯的各自信件中,竟写到同样不变的出版人的苦衷。可见存在于出版界的某些问题,其史实和人类文化同属源远流长。

鉴于上述情况,笔者把重点放在作家与出版人的密切关系上,这对广大读者及同行也许更有兴趣。否则谈出版不提作家就失却了整个事业的意义,但为了避免节外生枝,当前在世的作家书信一律不予引用,但对尚在执行业务的出版人与编辑则不在此例,而他们所发给作家的信件有必要时不妨摘录以补充史料。这些通讯内容除了少数业经公开引用过的,被大部分未经发表。其中很多反映当时的政治与社会道德趋势,既有发自不景气中的求救,也有昌盛时期的欢呼,有的来自战争前线,莽林深处,更有荡漾在风和日暖的南海岛屿上而不忘出版人的友情者。

总之,这是一部简略的跨世纪出版史,不使用枯燥无味的大事记形式,但通读之后给人一种印象,读书界与出版业之间是保持着久长的连续性的。正当外面世界从马车演变至飞机时代,文学的趋势也明显持续前进。至于美国出版界的“百年老店”史克里勃纳父子公司,我所深知的光辉业绩和其短处,都将在读者前作一陈述,为它进入第二个百年扫清道路。

## 二 清苦的事业

翻开出版人的通信档案，引人注目的是作家来信中的无数衷情诉述，告急的居多，其次是拒绝出版人插手写作。但经过种种矛盾的解决，终于使一部优秀作品问世了。

文学创作终究是种清苦的事业，经常处于曲高和寡的局面。但从出版人与作家之间的频繁通信中，也能感到后者确实需要精神和物质的资助。两者虽然不象舞台演出那样立下严峻的双方规定，但创作艺术多半依靠作家的孤军奋战，这是无可异议的。

二十年代新作家汤默思·伍尔夫<sup>①</sup>早在青年时期就感到孤军奋战的必要。1929年致史克里勃纳杂志编辑部的信中他痛诉了在独自写作中的种种恐惧和苦恼情绪，其后获得编者鼓励后，始精神大爽。他在答复出版人的信中写道：

我已不再感到孤独。多少年来，我未能象现在那样的精力充沛，强劲有力和无穷希望。我的胸中酝酿着好几本书的腹稿，它们都充满了生气和多种多样的丰富细节……我好象满肚子的原料快溢到嘴边，全美国的宝藏象一片平原伸展在我的脚下……它们千姿百态在城市中闪耀着光芒，把人们搅得眼

花缭乱手足无措……我这时正把其溶炼成比较平静的气质……我急不及待地想撕裂我的胸膛，让朋友们瞧一瞧蕴藏在我心底的一切。我真想一下子把货色全陈列在桌上——只要有一件获得人们的欣赏，我将立即对他们说，“我只展出了胸中不到十分之一或二十分之一给你们。等着瞧好的吧。”

有时节伍尔夫又沉入“大孩子的心理——总觉得比我更年长者是多么的智勇双全，他们定能助我一臂之力的”。他所指的长者无非是出版社派去的专人，帮助他理顺和删节大堆原稿，并把他从隐居中引出来；可是他们从来不打扰他的构思，也不作任何代庖之举。他们决不教他如何写作，由他在孤军奋战中悟出这“清苦事业”的真音。

在他之前，亨利·詹姆斯<sup>②</sup>也已遇到了“作家的可怕规律”逼着他远离社会生活，但他还是禁不住来信给编辑部说，如果没有出版人的友情，“对我来说世界就成了沙漠”。可是他也和年轻的伍尔夫一样，终究要在孤独中找到力量的来源。若干年后，评论家马迪森继《美国文艺复兴》巨著又专论亨利·詹姆斯的文学创作，并提供了后者的笔记中语：

“在孤独中整个世界发出光芒——我重又感到肩负全人类多层次的处境和繁复的景象，生命的波涛汹涌和所加于我的压力。全部的激情和其组合都呈现在我前面。”

几十年后，年轻作家菲兹杰拉德（1896—1941）在感受同样奈何不得的潜意识冲动时，在万分痛苦中挣扎。这位作家感情丰富，热爱周围的人们，与不同想法进行争辩。可是他也深知自己的弱点。1924年他写信给名出版家兼编辑麦克

斯·帕金斯<sup>⑧</sup>：

我现在感到内心一股巨大的力量，远超过以前的任何式样；虽然它使我的写作很顺手，但由于我太爱闲聊，脑海中时而出现无数魑魅幽灵，我缺乏久长的内心沉思，很难发展我的独立思考。而且我从未见到过有象我这样，年仅27就徒然消耗大量的个人经历。

菲兹杰拉德不时向出版人作冗长的忏悔和自白，不须分析也很明白，而且语中充满警告。多少年来，作家们往往通过“模子”来塑造某些社交人物的表现——而菲兹杰拉德却不屑这样做——他的小说构思往往跟着亲身体会的浪漫时代而萌灭。可是今天还和我们共生息的作家们，很多尚不理解“闲聊”对写作的不利。特别是当前通话条件大大加速，菲兹杰拉德所着重提出的警句比当年更合时宜了。

苏格兰诗人史蒂文森（1850—1894）写过《金银岛》和《新天方夜谭》，到过南洋诸岛，受萨摩亚族人的俸禄，因而能远离人世甚至孤居高山顶上看世界。他曾发表一封公开信《致志在艺术生涯的青年们》，历述外界对作家孤寂的劳动漠不关心，在长年累月的创作、修正和完善一己的作品之后（正如巴尔扎克说的“他象矿工被埋在塌方中”，日复一日在地下进行生死搏斗，而外界却置若罔闻）。这些默默无闻的劳动一旦获得成果，也许在死后才得以扬名，都将与他无关。然而作家在有生之年依旧独自奋战于书房中，一丝一毫不放松他对理想的追求。

总之从浩瀚的记录中所见到的，严肃的作家除了本身挣扎之外，难得呼求外界的拯救。并不是说他们不寻求外界的帮助，在他们的自白中可以看清他们不断在找寻；从茫茫大海中向编者之舟发出呼救。可是站在瞭望台上的编辑却心中有数，他的作家决不会游向救生船边，只会跃入更深的水中，最终到达他所选定的彼岸。

对出版家来说，也许在作家遭到挫折时，会低头求援，不过是为了实在走投无路的原因。他也许找不到一位善心人，也许出于文人相轻，各自打算。甚至夫妻之间也会对第三者的劝告起反作用。但是一位作家和他出版人的利益总是一致的，不管双方的要求相去多远。

近代作家比前辈更直率和容易激动。菲兹杰拉德于1920年对自己的作品失望之余，给帕金斯写信宣告从此不当作家，而以拾垃圾为生。时隔四年在致出版人的信中，他又写道：

最近四个月来，我开始明白了自己有了多少成就——哦，自从出版《美丽与丑恶》一书后的三年中，我简直倒退了。

这位作家虽然有时不免表现自卑，事实上他正在创作传世之作《了不起的盖茨比》。此书经过四个月的努力，使菲兹杰拉德发挥了卓越的才华，他出乎意料地完成一部空前杰作。事后，他情绪恢复正常，在通讯中写道：“我认为这大概可算是美国小说史上的最佳作。”

至于汤默思·伍尔夫刚从瑞士回国定居，他发现那地方经

常闹进喋喋不休的人们，他提笔给出版人写道：“我中断写作，而且再也不想动笔了。”这句话是在出版了他的成名作《展望归途，天使呀》之后不久。他心有不甘，接着说：“人世已无值得生活的去处，也没有合适的气氛写作……”

有经验的编者对这种低落情绪向来是置之不理。他们很懂得作家脑海里的辉煌形象和其平淡无奇的纸上语言之间有道鸿沟，而失望情绪往往盘据其上。可是他们也明白，作家的一时叹息正是走向更大前景的信号，他只是想找个不同的目标换一换气氛。例如帕金斯这位天才的编辑，就有本领在一位作家自怨自艾的节骨眼上变换话题。他就爱趁机大谈其他作家的情况和他们的作品，或是故意激励作家谈些政治形势，直到引起作家注意写作之外的广大世界和花样繁多的外面生活。

有一次帕金斯接待一位满腹牢骚的作家，他为分散对方的忧心只得离开办公桌走到窗前，从高楼上看着街心沉思起来，瞧了一阵之后仍旧背朝作家说：“我真不了解，街上人来人往都走得这么慢。唯一步履迅速的是那几个滑旱冰鞋的男孩儿，他们又显然是闲着没事。唉，我们每个人难道就不该穿上冰鞋跑步吗？”

老编辑布朗纳尔经常愁眉不展，好象人世的烦恼大半由他承担，作家们见此情景有苦不敢多说。但这是他的一套做法，他就是行动缓慢一些，对方若有耐心等待，他会忽然冒出机智甚至十分幽默的评语，足以解开你胸中的一半疙瘩。他说话委婉、极需对方专心聆听，以理解他语中的深意，他从不直接指点作家的写作，然而句句有针对性，多半须由旁听者回去捉摸一番，自找修改的途径。他常常在信中写道：

我也说不清为什么，总之……文章就在此处展示。这等于说：“我们一起来研究个方案吧，可我和你同样的摸不到头绪。”他是从来不强加于人的。

我父亲老贝林格姆又是一种做法，他爱引经据典，他的记忆力过人，必要时能为作家提供丰富的史料。我记得他曾对某一找他出主意的作家说，“重读《威尼斯商人》中的商人女儿杰西卡求爱一场戏，也许对你有关篇章的情节有所启发。”

他老人家的引经据典不同于按手册使用工具那样呆板。女作家伊迪丝·华顿写《树上的硕果》一书时遇到难题，我父亲建议她翻阅一下格·李文斯东的旧书。她找到了所要的答案。1900年在致布朗纳尔编辑信中说：“我一口气写了四万多字的《山谷》故事，忽然思路枯竭。我只得转向短篇小说，换了一个式样立即恢复了我的活力。”但她究竟久居孤独创作的状态中，颇似巴尔扎克所说的“矿工被埋在塌方下”，不能总把出版人的援助置之度外，她在信上说：

你的来信指点了我十字路口的正确方向……我将重读《树上的硕果》原稿，按你的有益评语，进行探索，我认为有可能找到出路，我呆在地下矿井太久了，能上地面来见一见阳光该是件好事。

可惜作家的生涯很少一帆风顺，有价值的一点是他们多半能从中吸取教益，重振旗鼓进行创作，而编者又善于说服新进作家，这种创作中热忱的起伏原是正常现象，不仅可以治疗，而且对今后的免疫力大有好处。为了创作能顺利进行，

他将在对方的工作和生活的每一紧急关头予以鼓励和更具体的帮助。

有些作家的构思缺乏纲目，故事情节因人物而展开。一部小说深入时，人物反而独立发展到难以控制的地步，作者有时听其自流，大有水到渠成的趋向。编辑在见到手稿之前只能掌握一些故事梗概或片断，往往疏忽了故事的终点只存在对方的脑海中，等到作品完成后也许和原来构思的面目全非。

舍伍德·安德森（1876—1941）的脾性古怪，对写作有诸多迷信。1935年给帕金斯的信就表示极力反对一部作品在未完成前给任何人看，连提到书名也有反感。

时代变了，近代作家多数由代理商或出版人经管他们的作品的出路，未成书前就受到先定书目和签订合同等等的困扰。甚至为了日后的销路，他们要求作者在下笔前便作广播谈话，书到半成，则安排各种酒会与作家迷们相见。对作家来说，这是种致命伤。凡能抵制这种行径者可说是英雄好汉，因为在许多情况下，尤其是预支稿费或作过其他经济安排的代理人会借口写作时间太长而不见书稿，会造成读者的淡忘等等理由，使作者难以应付。

当然，诚挚的作家通常是拒绝上述的做法，甚至在一部小说未完全脱稿之前是不愿见之报端。另一方面，也有作家偏向于锦上添花，作无休止的修改和润饰，致使出版人因延误发稿而损及作家的本身声誉。我们的资料中有不少编者被逼得走投无路，只得不顾一切闯入作家书房去求告。有的经过一番劝说抢了稿件就走。在这种情况下，出版人这种鲁莽行动不一定有害，有时确实救了一部艺术作品，但也有须考